

仲伟行

常熟私家藏书在中国图书馆学发展中的地位 and 作用

摘要 常熟私家藏书及其学术活动,对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图书馆学的发展,对目录学、藏书学及图书刊刻流布,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图书馆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 图书馆学 常熟藏书家 目录学 刻书

分类号 G256

ABSTRACT Private book collectors in Changshu and their academic activities have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ianship and library science in modern China, and hav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bibliography, book collection theories and book printing.

KEY WORDS Library science. Private book collectors in Changshu. Bibliography. Book inscription.

CLASS NUMBER G256

常熟的私家藏书现象始自宋元,盛于明清。宋有郑时、钱俟;元有徐之震、虞子贤,明有陈察、杨仪、赵用贤与赵琦美等 20 多家;明清间,钱谦益、毛晋誉满江南,继有冯舒、冯班、钱曾等 40 多家;至清代中叶后,常熟藏书家更是层出,影响甚大。据瞿冕良著《常熟先哲藏书史略》载,自北宋郑时始,至 1949 年凡 800 余年间私人藏书家约 225 人。正如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所说,“以苏省之藏书家而论,则常熟、金陵、维扬、吴县四地始终为历代重心”,而常熟居首位。范凤书统计出中国藏书家人数最多的 10 个市县为:苏州、杭州、常熟、湖州、绍兴、宁波、福州、嘉兴、海宁、南京^[1],常熟居全国之三,立于县级之首,可见常熟一地私家藏书之地位是举足轻重的。

从近现代图书馆与藏书楼的关系来看,没有藏书楼的存在,就没有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产生。常熟一地久盛不衰的藏书实践活动与中国图书馆学发展史有着密切的联系,为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积累了大量有用的经验和资料。如孙从添的《藏书纪要》在很大程度上为现代图书管理学奠定了基础;钱曾的《读书敏求记》使目录学的发展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毛晋的抄书不仅丰富了图书典籍的形式,而且丰富了版刻及藏书学方面的内容等等。常熟的藏书家从历代藏书家及其藏书活动中,总结了丰富的经验,创造了许多方法。有些方法和经验,已经提炼为规律性的知识,成为科学的或者是接近于科学的理论,在图书馆学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做了开拓性工作,有着可贵的创新精神。这就足以证明:常熟私家藏书在我国图书馆学发展史上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1 孙庆增《藏书纪要》对图书馆学的贡献

孙庆增(1692~1767),字从添。他的《藏书纪要》详细介绍了古人藏书的购求、鉴别、抄录、校雠、装订、编目、收

藏、曝书八则,被学者们称作是“我国全面论述藏书技术的第一本专著”。谭卓垣在《清代藏书楼发展史》里评述道:“《藏书纪要》是整个 19 世纪唯一的一部向私人藏书家交代藏书技术的参考书。令人惊奇的是,他所提出的意见一向为藏书家们谨守不渝,直至今日还对现代中国的图书馆发生着影响……假如今后还没有著述来取代《藏书纪要》的地位,那么,中国的藏书家们还将在各方面仰仗于它。”应该说,这样的评价是中肯的。

然而,笔者认为,从我国图书馆学角度分析,是书还不仅是一本技术书,而且还应是图书馆学的奠基性学说。《藏书纪要》就是从藏书及藏书楼的管理角度形成的理论,它与图书馆藏书建设中包括的藏书补充和藏书管理两方面内容是相当一致的,也就是说,它与图书馆学的重要分支——藏书组织学或图书管理学一脉相承。

在藏书补充方面,孙氏的藏书理论实际上涉及到了广义的“购书之法”,包含了“购求、鉴别、抄录”。他将明人谢在杭《五杂俎》中的求书“五难”,发展为“六难说”。既然那么难,如何求购呢?他对宋郑樵的“求书八法”和祁承业的书搜集方法从另一角度提出自己精到的见解,作了重要的补充。其次,对藏书质量的鉴别,有其独到的标准。他认为抄本胜于刊本,但必须有抄书的严格要求,抄书样本要好。抄写字样要“笔墨匀均,不脱落,无遗误。乌丝行款,整齐中带生动,为至精而备美。序跋、图章、画像,摹仿精雅,不可呆板,乃为妙手。抄书者要明于义理者,一手书写,无脱漏差误,无破体字,用墨一色,方为最善。”他认为只有这种刊本,才能比刻本更为贵重,可为藏书家奉为至宝。他还将校勘古书看作藏书必要条件之一,所述校雠理论操作性极强,对规则、校本来源、校改用材料、粘贴方法等都有明确论述。这些理论对提高当时私家藏书建设的质量有指导意义。

从藏书管理方面看,从最原始的藏书至现代化的图书馆,

都有一个藏书的组织管理问题,即叶德辉所谓“藏书之宜”。图书管理学是在古代藏书整理和编目工作中发展而丰富起来的,孙氏把私人藏书目录的编纂和目录体系的完善从理论上进行了高度概括和详尽阐述。他的编目方法,在藏书管理的历史上是首创。他着重谈了编目问题。

一是“编大总目录”,相似于图书馆的分类目录,管理那些“可流传的本子”。“每类后留空白页”,以便分录后增各类新书,如同我们的分类排架必须预留空间一样。

二是编“宋元刻本抄本目录”,总录成一册,谓“不可轻放,恐人借观遗失”,也就相当于我们图书馆的古籍善本书目录,这是从书籍外在载体形式来区分的库藏目录。

三是编“分类书柜目录”。这里分了两个层次来谈:其一,“以便检查而易取阅……”,其中分上中下写柜门背面书单,书本式目录亦一一对应记录书柜内上、中、下层的书名,一目了然。这种固定架号的形式排架法,至今图书馆古籍的排架还在沿用着。其二,“有人取阅借抄,即填明书目上,一月一查,取讨原书,若一月不还,当催归原柜,不致遗失”。这里的分类书柜目录又起到了书籍流通管理的工具作用,可见那时的借阅虽然限于少数读者,但已经有“一月”的规定期限,靠书本式排架目录来记录借阅及注销情况。

四是编“书房架上书籍目录”。此目录录一些未订书、抄补书等,这可以说是图书馆分类编目过程中书籍待编入藏前的过渡书目,是临时工作目录。因为这架上书的确是临时摆放的,但也必须设置登记的目录。这就可以想见,这种藏书楼的藏书管理是多么严密、细致,我们的图书馆编目工作也不一定会会有这类目录。

除编目外,孙氏对藏书保护也特别重视。《藏书纪要》涉及到了藏书楼的建筑;书架书柜等设施制作的美观实用性;连钥匙小方牌如何精工细做、方便开启等都想得十分周到;防鼠害、蚁灾、蠹鱼、防火、防蛀、防霉等;曝书的手续、季节及技术要领等等。实际上至今我国各地许多图书馆中古籍之保管技术尚没有超过孙氏所描述的那种程度。我们对于古籍的保护,例如古书的维修保养,许多细节远没有孙氏那么重视并研究得透彻。

对藏书的装帧,孙氏也有自己独特的理论,追求尽善,崇尚古朴。曰:“钱遵王述古堂装订,用自造五色笺纸,或用洋笺书面,虽装订华美,却未尽善。不若毛斧季汲古阁装订书面,用宋笺藏经纸,宣德纸染雅色,自制古色纸更佳。”

《藏书纪要》是孙从添应许多藏书家“同志者”的要求而撰成的。这说明,常熟藏书家们丰富的藏书实践发展至一定程度,需要有经验的总结和理论的提升,而孙是一位善于研究总结几乎可达“科学成果”的学者藏家,他将丰富的藏书实践经验凝结成条理系统的理论,因而使他成为中国图书馆学史上里程碑式人物。在他过世后的一百多年中,其理论不仅成为私家藏书之“指南”,“汲古之修绋”^[2],而且对近现代图书馆及图书馆学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2 钱曾《读书敏求记》等和目录学的兴盛

刘国钧曾指出:目录学和图书管理学是图书馆学的两根重大支柱^[3]。

常熟藏书家以精辟的目录学思想和高超的学术造诣构造了全新的目录形式,使用别人从来没有想到的方法来拓

展目录工作的内容,这是要有前无古人的勇气和胆识的。这方面,首推创立版本目录的钱曾,其《读书敏求记》是版本目录的奠基之作。

钱曾(1629~1701),继承其父钱裔肃藏书及本家曾祖钱谦益藏书,又多方搜罗,以家藏4100余种图书部署甲乙,运用不同体例,先后自撰《述古堂书目》四卷、《也是园藏书目》十卷以及《读书敏求记》四卷。《读书敏求记》收书634种,援焦氏体例,参以己意,专记所藏宋元精槧或旧钞,每书之下标明卷帙完阙,古今异同,并详考授受源流,还兼及作者、作品的评论,刊刻之工拙,版本之优劣。《读书敏求记》提出从版刻、刀法、字体、行款、刻工、纸张、墨色来比较科学地确定雕印年代,从祖本、子本、原本、修本来定版本价值的理论,最初确立了鉴定古籍版本以物质形态和版刻风格等外在形式来衡量的标准。传世之后,开创了清代学者注重版本、编撰善本书目的风气,从而为古籍版本学的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此书“是我国第一部研究版本目录的专著”^[4],对古籍版本研究富有参考价值。

此书在中国目录学和版本学发展史上都曾起过重大的作用。王重民在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时提出《总目提要》“汲取了清代《读书敏求记》和朱彝尊及常熟派校书家所写题跋记的方法和形式”。康熙之后,产生的众多善本书目和题跋记等著作,就是受《读书敏求记》影响的结果。吴焯在《读书敏求记》跋中说,他接受了马寒中赠予的《读书敏求记》,才能借助这一版本目录工具,顺利进行校勘;清代海宁州学训导钱泰吉,读了《读书敏求记》后,才知道经史子集四部的大致情况,使他有志于收藏图书,最后成为著名藏书家^[5]。

钱氏之外,张金吾、毛扆、瞿镛等对目录学的贡献,都是很大的。

张金吾(1787~1829)的《爱日精庐藏书志》则创立了另一种目录形式。《爱日精庐藏书志》详细记载了一代藏书名家的秘藏,使许多失传的古本得以留档存案。张氏创制的“藏书志”这种目录新体制,在中国目录学史上颇具研究价值。杨守敬在撰写《藏书绝句》时,就运用了不少张氏书志的记载。

毛扆所撰《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一卷,以时代的划分,标出宋本、元本、旧抄影宋、校宋本等,详载某书刻于何时何地、一页多少行、一行多少字,以及字形大小、墨色浓淡,便于鉴证,成为最早的著录较完备的善本书目,为后世藏书家鉴赏及利用提供了参考,开目录学中一书别标宋本、元本之先河,在目录学史上也是具有开创性的。

瞿镛的《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是近代目录学史上又一硕果。其所录每书之下,记卷帙存缺、行幅字数、序跋印记,并校讎异本文字,形成较完善的解题目录,成为后世整理古籍,考辨存佚的重要依据。“读一书可得数书功用,在近世藏书志中,尚没有超过他的”^[6]。今天,有人把钱曾《读书敏求记》、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瞿镛《铁琴铜剑楼书目》等称为最重要的研究版本学的文献,可见,常熟藏书家的目录学贡献是不可低估的。

3 毛氏刻书抄书和藏书学的发展

有了图书才有藏书,藏书即是藏书楼的基础,人们对图书的认识不断深化,其思想学说和理论方法,形成了图书学及藏书学研究成果。如果从狭义角度说藏书是一种被动收藏行为的话,那么抄书与刻书便是藏书家们的主动行为。伴随着藏书家们对校雠、目录、版本研究、抄写、雕印、出版这些生动的藏书实践过程,推动了藏书、藏书楼以及藏书事业及其理论的发展。而此中,常熟藏书家们在图书抄刻传播方面的作用是十分突出的。

毛晋(1599~1659),可称得上是明代晚期最著名的藏书家兼刻书家。他刻书的目的是要使人能“得见宇宙之大全,故于经史全书,勘讎流布,务使学者穷其源流,审其津涉。其他访佚典,搜秘文,皆用以裨补其正学”^[7]。“子晋本有田数千亩,质库若干所,一时尽售去,即以以为买书刻书之用。创汲古阁于隐湖”^[8]。他刻书的资金除售卖已刻书来周转外,还售去良田以作补充。毛晋所刻图书,均为传世精品。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所据底本质量上严格把关,多采用宋本作底本,且经精审精校,有精良的版本作底本就有流传的价值。二是用纸讲究。其印书纸张,每年都从江西专门定做,厚的叫“毛边”,薄的叫“毛太”,这种纸直到几百年后也还很有名气。三是精挑刻工,“其时银串每两七百文,三分银刻一百字”^[9]。自明万历末迄清顺治初的40余年中毛氏刻书达600多种,其中以《十三经注疏》、《十七史》、《文选李善注》、《六十种曲》及《说文解字》等为最著名,当时就有“毛氏之书走天下”的美誉。

毛氏刻书不仅在当时当地繁荣了图书市场,而且波及了全国各地,引发了吴中地区藏书家的刊刻高潮,推动了文化发展,推动了版刻事业和藏书事业的前进,也影响了以后数代人对历史藏书文化传播的重视。

“影宋抄”是毛晋对图书文化发展的又一重大贡献。

毛氏深知宋本书将日渐稀少,决心以推行其流布为己任,创造了“影宋抄”的方法。“罕见而藏诸他氏不能购得者,则选善手以佳纸墨影抄之。”“影宋抄”就是将质薄而坚韧的纸复在宋刻本上照其点画行款一笔不苟地摹写,这样的摹写本酷似原本。孙从添《藏书纪要》说:“汲古阁影宋精抄,古今绝作,字划、纸张、乌丝、图章,追摹宋刻,为近世无有能继其作者。”毛氏使抄书推向了一个质量巅峰,也是图

书学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

由于影宋抄保持古本原貌,使濒于灭绝之书得以流传久远,其功莫大焉。上海图书馆珍藏中的毛氏影宋抄本《南宋六十年小集》52册,纸墨精洁,字划严整,影抄的都是宋人集子,如今宋本不见传世,仅赖毛氏影宋本以延续。当代著名图书馆学家来新夏先生说得好:许多藏书家“不惜巨资大量地精工传抄,……特别是毛抄更是驰名遐迩,这种一时成风的抄书活动的文化现象,极大地丰富了藏书文化的内涵。”^[10]

常熟藏书家兼刻书者还带有前赴后继的色彩,精神执著。明代胡震亨于万历年间曾辑刻丛书《秘册汇函》,但此书未刻全,残版后归汲古阁,毛氏据此扩而增之,加刻成《津逮秘书》,嗜书者偶得之,视为拱璧。至清代张海鹏又在汲古阁本基础上,精选、补充自购善本,再借各家之本,增订而成《学津讨原》,使许多几将绝世书籍得以流传。其侄张金吾于嘉庆己卯(1819)印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520卷,也是私家木刻活字印书中十分有影响的。

刻印书籍自然推动了私家藏书的发展与普及。常熟藏书家们普遍从事自家藏书的校勘研究、编辑刻印等,为我国图书史的研究提供了生动而丰富的资料,对当时和以后的学术文化发展贡献很大。

参考文献

- 1 范凤书. 中国私家藏书概述. 见:天一阁论丛, 宁波:宁波出版社, 1996
- 2 叶德辉. 藏书十约序
- 3 刘国钧. 什么是图书馆学.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 1957(1)
- 4 吴仲强等. 中国图书馆学史. 长沙:湖南出版社, 1991
- 5 钱泰吉. 藏书述. 见:藏书四记, 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 1998
- 6 严佐之. 近三百年古籍目录举要. 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 1994
- 7 钱谦益. 隐湖毛君墓志铭
- 8 钱泳. 履园丛说
- 9 徐康. 前尘梦影录
- 10 黄建国, 高跃新主编. 中国古代藏书楼研究. 北京:中华书局, 1999

仲伟行 庞震[✉]美术馆馆长, 副研究馆员. 通讯地址:江苏省常熟市. 邮编 215500. (来稿时间:2001-06-22)

(上接第82页)这种期待值往往不易被发现或者说是不能被体现的。为了对图书馆系统进行合理调控,馆员必须主动了解和掌握读者的期待值,并努力开发这种期待值。

读者的期待值主要来源于读者的反馈。可以按照反馈的深刻性把反馈分为感性反馈和理性反馈。感性反馈往往是不深刻的,它是来源于读者的浮浅的、表面的感受。馆员应努力调动读者反馈的积极性,采取必要措施诸如发放调查提纲、设计调查表格、编制调查问卷等使读者的感性反馈上升为理性反馈。除了调查了解之外,尚需对读者的反馈信息进行分析、归纳和提炼,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准确获取读者的期待值。依据读者的期待值并结合图书馆的客观实际,制定具体规划和方案,以实现对图书馆系统的整体

调控。由于这种调控是以读者的期待值为依据的,故调控后的图书馆无疑将能更好地适应读者的需求。事实上,只有定期了解读者的期待值并不断对图书馆系统实施调控,才能使图书馆系统始终处于最佳运行状态。

参考文献

- 1 朱立元. 接受美学.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13~37
- 2 汉斯·罗伯特·尧斯. 作为挑战的文学史.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9~12
- 3 王忠勇. 本世纪西方文论述评.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1989:40~50

王金玲 廊坊师范学院图书馆馆员, 现在该院教务处工作. 通讯地址:河北省廊坊市. 邮编 065000. (来稿时间:2001-07-12)